

比例大,召集人为董事长或者CEO时,风险管理委员会与公司价值的正效应更明显;提高公司内部控制水平是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升公司价值的重要途径。

七、审计研究

有学者就全流程国家审计腐败治理的机理与路径进行研究。当前,国家审计主要采取事后审计模式,缺乏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难以有效遏制公共资金、公共权力、公共政策腐败。审计机关突破事后监督的思维桎梏,前移审计关口,推进从事后审计向全流程审计转变,加强对公共资金使用、公共权力运行及公共政策执行全过程的监督,及时发现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及时实施审计整改,从而建立一个有震慑力的监督机制,提升国家审计治理能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有学者就国家审计、政府治理与地方银行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审计能够有效降低地方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提升资本充足率和资产收益率,起到防范金融风险、提升地方银行经营稳健性的作用,政府治理发挥了中介效应。

有学者就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审计信息披露与审计整改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整改情况对公开审计信息的数量并不敏感,但与公告、报告的信息质量有关;向人大提交的审计报告比向政府提交的审计报告在整改效力和效果方面均有更好表现;审计提出建议的详细和具体程度与审计整改效力呈正相关关系,但与整改效果之间的关系不明显。民众的审计需求越大,则审计整改效力越大、效果越好,这说明应加强审计信息在民众之间的流通,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这些结论不仅印证了审计信息披露差异确实会影响审计整改成效,还彰显了现代社会对打造多元共治格局的强烈需求。

有学者就审计发挥经济体检作用进行研究。审计发挥经济体检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国家审计功能的最新定位和要求。审计发挥经济体检作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经济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认识的必然结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审计监督功能作用的精准定位。

有学者就审计机关购买社会审计服务决策进行研究。审计机关购买社会审计服务是基于承接单位所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可以达到预期、承接人员可以做到勤勉尽责这两个前提。通过服务购买,审计机关与社会中介机构缔结经济契约,弥补自身审计资源不足。不同社会中介机构所能提供的审计服务在质量和价格上是有差异的;由于信息不对称,社会中介机构作为审计服务的供给方可能会选择性提供审计业务能力相关信息,审计机关可能无法优选目标而出现逆向选择现象。面对质量和成本双重目标约束,在探索协调路径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根据审计机关购买社会审计服务的特点,构建各指标的层次结构模型,从质量和成本两个维度进行量化分析,提出可行性方案,再进行决策。这种方法可以解决目前审计机关购买社会审计服务中可行性方案量化不足的问题。

有学者就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政府审计显著增加了国有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和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样本企业中,政府审计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有学者基于资产保值增值的国企审计和巡视频度安排与协同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一届政府任期(五年)内,相较于没有或二次被政府审计或党委巡视的国企,被审计或巡视一次更能有效促进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政府审计与党委巡视实施时间间隔24个月以上,督促国企资产保值增值效果更佳。

有学者就经济责任审计覆盖率与地方国有企业杠杆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责任审计覆盖率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地方国有企业的有息负债率;从地区层面来看,在政府干预程度较大的地区该影响更为显著;从企业层面来看,在金字塔层级较多的上市公司中该影响更为显著。经济责任审计覆盖率的提升会降低地方国有企业获得的贷款期限,同时提高企业贷款使用效率和地区的信贷配置效率。

有学者就经济责任审计方式对公司股价和经营业绩的影响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较任中审计,经历离任审计的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价市场反应更加显著为负;较离任审计,经历任中审计的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会计业绩显示出更强的上升趋势,而在市场业绩上没有相同趋势。

有学者就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监管职责进行研究。通过对各个监督体系的比较发现,审计监督相比于其他监督形式,更具有独立性与专业性,发挥其特有的“二次监督”作用能减少精准扶贫工作当中存在的重复监督与职能交叉问题。研究审计机关与其他监督体系相互协作的作用机理,可提高扶贫领域各监督体系的效率与节约监管资源,为巩固国家扶贫成果提供思路。

有学者对乡村振兴战略驱动农村审计的作用机理进行剖析。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国家审计机构主导、乡镇审计机构主力、社会审计机构辅助对农村审计模式产生作用;通过农村治理有效增加对农村审计资源需求,并在资源稀缺性的限制下,调整审计资源供给对农村审计主体产生作用;通过政府资金投入以及村民委托,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对农村审计客体产生作用;通过国家治理角度以及农村自治角度丰富农村审计内容,又在资源稀缺的限制下对审计整合产生作用;通过形成大数据审计需求以及增加大数据审计资源供给对农村审计技术方法产生作用;通过资源限制以及政策生效对农村审计结果落实产生作用。

有学者就地方治理中政府审计职能修复:双重障碍与消解路径进行研究。作为国家治理的参与者,政府审计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然而,制度重叠和信息壁垒构成的双重障碍制约了审计服务于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降低了政府审计职能效率的发挥,导致审计监督范围不足和着力点错位等深层矛盾。运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系统分析等方法探讨地方治理现代化困境的影响因素与成因。建议加强审计供需均衡,完善审计与治理理念、治理能力、治理结构、治理体系契合机制建设,寻求国家、社会、个人三者权益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形成纵向联动、横向协同的治理格局。

有学者就“瑞华之殇”带给独立审计的警示与思考进行研究。2019年7月,瑞华因牵涉康得新财务造假案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此事引爆了瑞华的负面舆情,合伙人、员工大量出走,业务出现断崖式下跌,瑞华短时间陷入分崩离析境地。“瑞华之殇”反映其在危机管理、一体化整合、审计理念、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对内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深入分析其根源并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对防止审计失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学者就审计重要性、重要性水平与审计风险进行辨析。审计重要性作为审计风险的重要判断标准,贯穿于风险导向审计的全流程;而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影响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的关键因素。由于重要性、重要性水平在术语方面的高度相近,导致在理解审计准则中“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表述时出现认知偏差甚至理解错误。厘清审计重要性、重要性水平的区别与联系、明确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对于清晰认知审计术语、理解审计准则和指导审计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有学者就审计结果法律效力及其规范进行研究。审计结果法律效力规范是对不同审计主体审计结果法律效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恰当界定与科学规定,以保证审计结果得到合理落实与执行,进而保障和提高审计工作质量。为此,需要在有关审计规范中明确界定审计结果法律效力相关内容,确立相关行为主体在审计结果运用过程中的科学定位,建立落实与执行审计结果的行为机制。

有学者就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变化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沟通关键审计事项对提高审计报告信息含量和审计工作透明度的作用初步显现,部分审计报告做到了持续增量信息,但也存在披露数量过少,内容过于集中,披露采用“套路式”文书等问题,可能会导致以后年度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减弱。

有学者就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与审计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来说,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会显著提高审计报告的审计质量;相较于高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低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只有披露资产负债类的关键审计事项会显著提高审计报告的审计质量。

有学者就关键审计事项与会计稳健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实施显著提升会计稳健性,关键审计事项越多的公司会计稳健性越高。

有学者基于利益距离调整的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利益距离是指各相关利益者对特定利益的取得在所有权、时间和空间等维度上的位置差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资源所有权和支配权、产品生产的时间和地点及外部性影响范围不同,存在着复杂的经济利益距离关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变革,必然需要对既有利益距离关系做出重大调整,但又面临诸多现实阻力。与此对应的审计职能定位则是依法全面监督会计记录与资源配置信息的一致性以

消除监督盲区,规范和保障各方合法利益,揭示重大风险隐患,降低收益的不确定性,以及通过绩效标杆拉动资源优化配置等。针对制约审计职能发挥的现实矛盾,需要构建起更完善的信息保障机制、绩效审计奖惩关联机制和审计监督体制机制等,充分发挥审计的利益距离调整作用机制,促进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有学者就提升商业银行经济责任审计质量进行研究。当前经济责任审计中存在画像不够准确、责任界定不清晰、审计资源配置不合理、审计评价不准确等问题,结合当前的困境及审计技术发展,建议从制定经济责任审计计划、构建被审计对象知识图谱、经济责任审计标准化建设、制定正向激励等方面提升经济责任审计质量。

有学者就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抽样方法应用是否规范进行研究。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比内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抽样基础工作做得更好,审计抽样方法应用灵活性更高,对控制测试重视程度也更高。审计人员对审计抽样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偏差,审计抽样准则还有待完善。

有学者就审计师工作量压力与盈余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存在门槛效应,行业专长水平越高,事务所组织支持力度越大,审计师工作量压力对公司盈余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小;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存在门槛效应,事务所综合评价水平越低,事务所组织支持力度越小,审计师工作量压力对公司盈余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会计师事务所人力资本存在门槛效应,人力资本质量越高,审计师工作效率越高,审计师工作量压力对公司盈余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小。

有学者就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市场环境与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发现: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导致管理层利用应计利润和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非国有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更善于利用隐蔽性较高的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并购事件的发生,会削弱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当首次收到持续经营审计意见时,管理层倾向于利用应计利润的操纵进行盈余管理,随着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次数增多,管理层转而利用隐蔽性较高的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市场环境越透明,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抑制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下的盈余管理。

有学者就年报问询压力与内部控制意见购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压力对公司内部控制意见购买行为在会计师事务所维度和签字会计师维度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这一治理作用在问询函具有“内控特征”或要求审计师发表专项意见的样本中更显著。将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分为向分所变更和向总所变更后,发现年报问询压力对内部控制意见购买的治理作用在向分所变更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年报问询治理效用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年报问询的治理作用对同行业、同省份和共同审计师的公司具有溢出效应。

有学者就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有助于企业创新,且这种效应主要集中在低融资约束和低信息不对称企业。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对创新的提升效应能够传递到宏观经济层面,显著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且这种效应

主要存在于沿海地区以及政府科技支出较多的地区。

有学者就新时代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审计理论建构进行探讨。建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治理和制度关系的具体体现。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和报告法制化、常态化的同时,内部控制审计在理论和政策上尚处于空白。结合国家治理理论、内部控制政策和实践,充分发挥我国特殊国情下的审计理论与制度优势,建构包括目标、主体、内容、标准、程序、报告六大方面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审计理论体系,即以合规保证和效率提升为目标,以内部审计做主力、社会审计做辅助、国家审计做监督为合力,以建设行为和报告信息为内容,以政策要求和法规条款为标准,以制度测试和系统测试为程序,以揭示问题和提供建议为报告,以期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审计政策制定及实践应用建立理论基础。

有学者就新时代推进碳审计全覆盖的问题与对策进行研究。从实践来看,我国碳审计起步较晚,存在碳审计制度与准则不完善、审计主体发展不充分不协同、审计内容不一致、审计方法落后以及审计结果运用狭窄等问题。通过分析我国推进碳审计全覆盖面临的问题,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碳审计实践及其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推进我国碳审计全覆盖的对策。

有学者就客户关系与上市公司审计定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由于议价能力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等因素的存在,客户关系依赖导致的经营风险水平的提高提升了上市公司审计定价水平。以托宾Q值与净资产收益率的方差来度量的企业经营风险在客户关系依赖程度影响审计定价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有学者就并购商誉、产权性质与审计费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存在商誉的企业相比于不存在商誉的企业审计费用更高,且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弱。在存有商誉的公司中,发生商誉减值的企业相比于没有发生商誉减值的企业审计费用更高,且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弱。

有学者就外部可验证的商誉减值与审计费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由于业绩补偿承诺增加了商誉减值信息的可验证性,相比于没有业绩补偿承诺的样本,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有业绩补偿承诺的样本中更小。相比于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的样本,商誉减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在业绩补偿承诺实现的样本中更小。相比于非国有企业,业绩补偿承诺对商誉减值影响审计费用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小。

有学者就内部人举报制度、舞弊风险与审计定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提供企业内部人举报的“吹哨”效应的制度建设,能够防患企业内部舞弊风险,抑制企业潜在的重大错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定价。内部人举报系统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重述与接到问询函的概率,抑制审计意见购买导致的审计费用增长;公司纪委的参与能够增强员工举报制度的执行力度,对平抑审计定价具有调节作用。

有学者就审计费用、产权性质与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较高的审计费用有利于缓解投资不足,抑制投资过

度;国有企业中,较高的审计费用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要强于对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民营企业较高的审计费用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投资不足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较高的审计费用对投资不足的缓解作用更强烈。

有学者就地区腐败与异常审计费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异常审计费用与地区腐败呈U型曲线关系,且这种U型关系具有明显的宏观环境异质性和企业特征异质性,即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前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和固定资产占比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分析显示,环境不确定性在地区腐败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腐败成为阻碍经济车轮前进的“绊脚石”,新时期大力打击腐败势在必行。

有学者就企业风险承担是否提升了审计收费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审计收费水平越高;相对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相对于民营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收取了较低的审计费用。法制环境在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风险承担收取较高的审计收费中起到完全调节作用,即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审计师对企业风险承担收取越高的审计费用;在对企业的风险承担收高审计费用的同时,审计师相应投入了较高的审计资源,降低了审计风险。

有学者就年报问询函、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年报问询函与审计定价呈正相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审计成本的度量指标——审计延迟,进一步揭示审计定价提高是审计师要求风险溢价补偿的结果,审计师并没有对收到问询函上市公司增加更多的审计投入。这种相关性在非国有性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差地区的公司中更为明显。

有学者就溢价并购与审计定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对溢价并购行为相应提高审计费用定价,保持了较高的谨慎性,且审计师倾向对上期盈利的企业和高两权分离度企业的溢价并购行为给予更高关注。建议审计应从源头把控溢价并购风险,充分发挥审计的外部监督职能,增强审计报告对投资者的效用。

有学者就公司诉讼风险对审计决策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诉讼风险越高,审计师收取正向异常审计费用的概率越高,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审计费用策略和审计意见策略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审计师倾向于在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时收取正向异常审计费用作为风险补偿。在外部法律环境薄弱地区,审计费用决策和审计意见决策之间的替代关系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合理解释和评价审计师的决策行为,对监管机构规范审计师的行为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有学者就研发投入、舞弊风险与审计费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与财务舞弊风险和审计费用均正相关,并且财务舞弊风险在研发投入强度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前三种度量方式(研发投入额÷总资产、研发投入额÷净资产、研发投入额÷

公司员工数)下具有很强的外生性,而在第四种度量方式(研发投入额÷营业收入)下是内生的。虽然高审计收费保证了CPA较高的执业努力程度,但与审计合谋正相关的异常审计费用的存在使得CPA审计治理效果并不佳,并且对研发投入强度大的客户、财务舞弊风险高的客户和高新技术企业收取更高的异常审计费用通常与更高的审计合谋倾向有关。

有学者就频繁并购重组与异常审计收费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频繁并购重组会导致审计师风险溢价提高。从商誉和盈余管理角度探究其路径机制发现,商誉和真实盈余管理是频繁并购重组导致更高审计师风险溢价两个重要中介变量,而应计盈余管理并没有发挥中介作用,即频繁并购重组企业操纵利润的手段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应计盈余管理。

有学者就雾霾污染对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雾霾污染会导致审计费用增加和审计质量下降。雾霾污染会通过增大企业经营风险和企业问题曝光风险来提高审计费用;雾霾污染会通过减少审计师的审计时间来降低审计质量;审计费用溢价增强了雾霾污染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雾霾污染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和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仅在非重污染企业样本中和非重污染地区样本中显著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雾霾污染影响审计行为的作用机制,为主管部门在雾霾污染环境中加强审计市场监管提供理论依据。

有学者就分析师实地调研影响审计收费的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分析师实地调研会降低其预测偏差,支持了调研信息有用性假说,否定了管理层乐观引导假说。一定程度上表明分析师调研信息能够作为其盈余预测重要且有效的信息来源;分析师预测偏差提高了审计收费,表明了预测偏差带来了更多公司战略风险及经营风险分歧,因此,会计师事务所更倾向于通过提高审计收费予以应对,而分析师调研行为会通过降低预测偏差进而降低审计收费;明星分析师、高经验分析师实地调研行为会强化实地调研通过预测偏差影响审计收费的中介效应,说明从调研信息利用效率来看,明星分析师和高经验分析师充分辨别及利用了相关调研信息,降低了预测偏差,减小了相关审计风险,进一步降低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水平。

有学者就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期年报收到问询函后,当期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收取的审计费用会有所增加。上期年报收到问询函后,审计师当期会增加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从而导致审计收费上升。关键审计事项在年报问询函与审计费用间的中介作用主要存在于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关注度低的上市公司。

有学者就对外直接投资、控制风险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进行研究发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审计费用显著高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说明审计师能够识别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导致的审计风险的上升和审计成本的增加,并通过增加审计费用的方式予以补偿;且此差异不因产权性质和企业所在地市场化水平而异;如果企业内部控制质

量较高,控制风险水平较低,则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会弱化,表明控制风险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费用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且此作用仅在非国有控股及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显著。

有学者就大数据、区块链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实施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会显著提升审计费用。这是因为上市公司运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会使审计师面临更高的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风险;面对更高的重大错报风险,审计师会增加相关审计程序,从而增加审计费用。上市公司运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并不会显著增加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但却会显著增加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国际“四大”能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的转型,适应区块链等新技术。

有学者就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分析师信息精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整体显著提升了分析师公共信息精度和私有信息精度,这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为分析师提供了新的信息,改善了分析师预测信息环境,验证了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之间的“互补效应”。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显著降低了分析师预测分歧度,且在管理层具有信息优势的情境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升分析师预测信息环境的作用更加明显。

有学者就年报问询函是否影响关键审计事项判断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年报问询监管有助于提高未来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从总分所层面,年报问询监管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的积极作用在分所层面更明显;再到审计项目团队层面,年报问询监管对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的决策效用在“低成本型”的审计项目团队行业专长中更显著。年报问询监管能够增进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来提升新审计报告的稳健性。此外,年报问询力度和具有风险特质的年报问询事项更显著积极影响关键审计事项信息量。

有学者就区块链驱动下基于双链架构的混合审计模式进行探索。区块链技术的特征与审计关系、审计行为的要求存在内在耦合性:区块链去中心化、数据透明性的特征能够促进审计关系的规范化;区块链不可篡改性、交易可追溯性以及可编程性等特征能够提高审计行为的有效性,据此可以构建基于双链架构的混合审计模式,即审计方以审计客体区块链和审计主体区块链的双链架构为基础,通过链上智能审计程序和链下人工审计程序的协调配合,对被审计方经济业务事项进行透明化、自动化、实时化审计的一种审计组织方式。基于双链架构的混合审计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审计效率和审计质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审计期望差距,但仍需关注其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潜在风险。

有学者就股价崩盘风险是否会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高,则注册会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越充分,这说明注册会计师在做出审计报告决策时考虑了股价崩盘风险。股价崩盘风险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盈余管理水平更高、风险承担能力更强的公司中更显著,且法律风险在两者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效应。

有学者就新审计报告准则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

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新准则的实施能够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当审计报告中披露了关键审计事项时，能够促使下一会计期间的会计信息可比性有所提高，且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数量越多，可比性越高。可比性的提高主要体现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样本和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说明以关键审计事项沟通为主要变化的新审计报告准则的实施，通过强化注册会计师、管理层及治理层的责任，在增加审计报告信息含量的同时提高了信息质量，对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有重要现实意义。

有学者就审计意见与商业信用融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类型能助力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亦对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金融生态环境与审计意见在影响商业信用融资方面存在“声誉互补效应”，而当金融生态环境指数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企业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将会降低其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

有学者就区域文化、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意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越高，审计师越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越低，审计师越倾向于出具标准审计意见；区域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越低，公司财务质量越低，审计师越倾向于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据此，文化环境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进而影响审计意见的重要因素，这可以为信息使用者从文化视角理解审计师的行为提供实证支持。

有学者就审计意见对审计质量的衡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通过选择低风险客户，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而降低了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审计师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较少，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审计质量较低。在用审计意见衡量审计质量时，不能简单地用非黑即白的方法进行判断，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学者就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语调是否影响审计意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信息净语调越积极，越能够发挥信息心理学的框架效应机制，降低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同时，公司良好的内部控制、较高的审计师行业专长能够弱化上述关系强度。年报文本净语调通过影响审计师对公司未来业绩预期和审计师时间投入来影响审计意见的出具。年报文本存在语调操纵的情况下，仍然具有心理框架效应，依然显著降低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概率。

有学者就非整合审计是否可以提高盈余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实施整合审计和非整合审计对于盈余质量的提升存在显著性差异，相较于整合审计，企业实施非整合审计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非整合审计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内部控制的的有效性，且随着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高，企业执行非整合审计对于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也更加显著。

有学者就公允价值计量层次、审计师行业专长与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和负债的比例越

高，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使用第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比第一、二层次公允价值计量对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更大；审计师行业专长并不能有效抑制上市公司通过运用公允价值计量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有学者就审计师利用专家工作是否抑制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师利用专家工作应对关键审计事项抑制了公司的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利用估值专家的工作有助于降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利用信息技术专家的工作有助于降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利用专家工作抑制了正向应计盈余管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是通过限制管理层对产品生产成本和操控性费用的调节行为来实现的。另外，在公司治理水平低、信息环境差的公司中利用专家工作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显著。

有学者就审计投入的产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审计投入与审计费用及审计质量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增加审计投入提高了审计费用及审计质量。审计投入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程度在不同规模的事务所中存在差异，在规模较大的事务所比小所影响更明显；审计投入的产出效应在不同规模和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有学者就企业研发支出与高质量审计需求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支出的增加会伴随着高质量审计需求的增加。无论企业规模大小、代理成本高低，当研发支出增加时，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概率均显著增加。研发支出与高质量审计需求之间的正向关系主要存在于高技术行业。当高研发支出公司聘请高质量审计师时，审计收费并未显著上升反而下降了。同时，高研发支出公司通过聘请高质量审计师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

有学者就行业监管是否能提高审计质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行业监管和审计师隐性知识都能够提升审计服务质量；隐性知识能够加强行业监管对审计质量的促进作用。行业监管与隐性知识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可能发生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与非国有企业，但隐性知识的调节作用更可能发生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与国有企业；行业监管与隐性知识都能降低审计报告激进性。

有学者就不签署审计报告的审计团队成员是否影响审计质量进行研究发现：团队成员曾参与被审计单位年审的次数越多，其本期参与的该项目越可能做出审计调整；如团队成员将在下一年成为被审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其本期参与的该项目越可能做出审计调整；在外勤负责人对团队成员具有更大需求的情形中（外勤负责人的执业经验更少或工作负荷更大时），前两项效应更为突出。这一研究首次提供了审计项目组内部代理问题的档案式证据，展示了审计团队成员的胜任能力和受托责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有学者就业绩预告准确性信息对审计师是否具有决策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业绩预告准确性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篇幅显著负相关，同时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业绩预告准确性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篇幅的负相关关系更强。上述负相关关系仅在强制披露的样本中才存在。此外，较低的业绩预告准确性会降低公司的盈余价值相关性，而关键